

本期专题 G20 峰会

- 02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 03 关于 G20 的一些知识
- 05 大国外交，泽润世界
- 06 六赴 G20，习近平始终强调这几点主张
- 08 G20 焦点议题及政策建议梳理
- 10 夯实 G20 “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地位

全球大观

- 13 贸易争端背后的全球供应链巨变

经济纵横

- 17 须高度重视贸易战纵深战场

科技前沿

- 19 5G·5 问

悦读时光

- 封三 高考：运气代差与概率噩梦

编者按：夏木繁盛，绿意盎然。元首外交再启程。6月27日至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从2013年到2018年，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土耳其安塔利亚，从中国杭州到德国汉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习近平已经连续六次出席或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数次演讲中，习近平始终围绕创新、开放、合作、共赢等关键词，为世界和平发展传递中国主张，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中国动力。

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主张立场备受瞩目。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七次出席或主持 G20 峰会，充分体现中方对 G20 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重视。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在 G20 峰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清晰展现。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最紧要关头，二十国集团临危受命，秉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把正在滑向悬崖的世界经济拉回到稳定和复苏轨道。那一次，团结战胜了分歧，共赢取代了私利。这场危机，让人们记住了二十国集团，也确立了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今天，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机制备受冲击的现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很有必要重温当年初心，坚持伙伴精神，展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发展进步大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不断延伸和拓展，带动了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习近平主席在 G20 大阪峰会上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倾听“中国声音”。

本期推出“G20 峰会”专题，围绕本次峰会重点提出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题的讨论，有针对性的选取相关文章，探讨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对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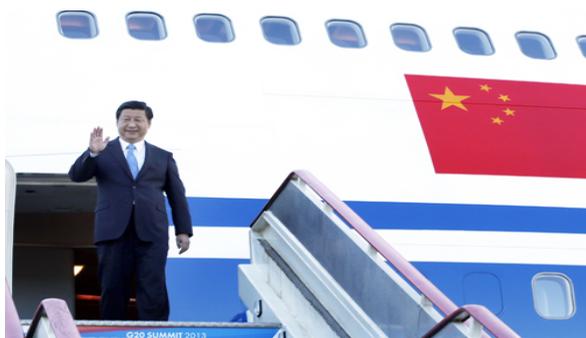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夏木繁盛，绿意盎然。元首外交再启程。6月27日至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习近平主席将在G20大阪峰会上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倾听“中国声音”。



把脉开方，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世人瞩目下，G20峰会大幕即将拉开。这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席或主持G20峰会，充分体现中方对G20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议，参加关于世界经济和贸易、数字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环境等议题的讨论。

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主张立场备受瞩目。此次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找根源、把准脉、开好方，把握好世界经济的大方向。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在G20峰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清晰展现。

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出席G20峰会，呼吁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6年间，习近平在G20峰会

上多次阐述重要主张：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说，习主席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长远发展，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将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

中国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应对风险挑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因此，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

立己达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完善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成果，是世界对G20大阪峰会的重要期待。“中国方案”将为全球议题带来重要解答。G20大阪峰会上，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牢牢把握G20的正确方向，坚持伙伴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保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各方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

关于 G20 的一些知识

6月27日至29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对于G20，你了解多少？对于此次大会的东道主，日本大阪，你又知道多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G20 什么时候成立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参与。1999年9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建立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G20就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1999年12月16日，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柏林举行G20创始会议。

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方期待各方推动在国际重要经贸议题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即建设性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构建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环境，加强贸易投资务实合作，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等方面，中方期待G20各方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继续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中心地位，同意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继续肯定绿色金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发展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增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中国不断就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提出重要主张，激起世界积极回响。登高望远，习近平主席指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四大挑战。为破解“四大赤字”，中国提出要坚持公正合理、互谅互让、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上承担了大国责任。”摩洛哥前经济与财政大臣、经济学家法萨拉·瓦拉卢如是说。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向来是积极行动派。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中国提供的观点是建立在自身丰富经验

G20 有 20 个成员国？

并不是，G20有20个成员或者说成员经济体，但这不等于20个成员国，欧盟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非国家加入G20的。实际上，G20由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等20方组成。

G20成员涵盖面广，剪性强，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衡，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的80%。

的基础之上，恰是当前人类社会亟须的积极且长远的发展观。

加强合作，携手各方实现共赢

G20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俄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非领导人小型会晤，就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合作。习近平还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致力于深化同有关国家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深化共识，推动合作，中国将继续携手各方，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美元首不久前在通电话时表示，双方愿意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用，推动G20大阪峰会达成积极成果，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G20大阪峰会能够继续展现凝聚力和行动力，为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指引、开拓新思路。中方愿继续与各方分享经验，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2019-06-25 新华社)



G20 的常设机构是啥？

G20 目前没有常设机构，主席采取轮换制。中国担任 2016 年 G20 主席国并于当年 9 月 4 日至 5 日成功举办了杭州峰会。

G20 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

G20 成立初期，其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即参与方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对话。2008 年金融危机后，G20 升格为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全球重大经济金融热点问题。领导人峰会启动后，G20 形成了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其主要运行模式是：峰会筹备工作在协商一致原则基础上，由“三驾马车”（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牵头、各成员共同参与，采取 G20 协调人、G20 财金渠道双轨筹备机制。

通过历次峰会，G20 领导人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跨国逃税、气候变化以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G20 峰会一直都是每年举行一次吗？

不是！2008 年 11 月，在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G20 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这是 G20 领导人首次峰会。此后，G20 领导人又先后在伦敦、匹兹堡、多伦多、首尔、戛纳、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和安塔利亚举行峰会。

2009 年 9 月，G20 匹兹堡峰会将 G20 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从 2011 年法国戛纳峰会起，G20 每年举行一次峰会，标志 G20 峰会机制化。

G20 关注哪些话题？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历届峰会的主要议题来简单了解一下 G20 的主要关注点。

| | 时间 | 举办城市 | 主要议题 |
|--------|--------------|-------------|--|
| 第13次峰会 | 2018年11月-12月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 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
| 第12次峰会 | 2017年7月 | 德国-汉堡 | 全球经济形势、贸易金融和税收、气候变化、数字化技术、难民和移民事务以及反恐合作 |
| 第11次峰会 | 2016年9月 | 中国-杭州 | 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 |
| 第10次峰会 | 2015年11月 | 土耳其-安塔利亚 | 世界经济形势、包容性增长、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贸易、能源、反腐败等主要议题。 |
| 第9次峰会 | 2014年11月 |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 促进经济增长与促就业、全球经济恢复力、贸易和能源等。 |
| 第8次峰会 | 2013年9月 | 俄罗斯-圣彼得堡 | 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就业和投资、可持续发展展和国际贸易等。 |
| 第7次峰会 | 2012年6月 | 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 世界经济形势、国际金融体系、发展问题、贸易问题和就业问题等。 |
| 第6次峰会 | 2011年11月 | 法国-戛纳 | 欧债危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监管、抑制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过度波动、发展问题和全球治理等。 |
| 第5次峰会 | 2010年11月 | 韩国-首尔 | 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问题等。 |
| 第4次峰会 | 2010年6月 | 加拿大-多伦多 | 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等。 |
| 第3次峰会 | 2009年9月 | 美国-匹兹堡 |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问题等。 |
| 第2次峰会 | 2009年4月 | 英国-伦敦 | 复苏全球经济、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放贷、加强金融监管、反对保护主义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等。 |
| 第1次峰会 | 2008年11月 | 美国-华盛顿 | 评估国际社会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共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举措 |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此次峰会的东道主——日本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面积 225 平方公里，人口 272 万人。它坐落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的大阪湾畔，濒临濠户内海，自古就是奈良和京都的门户，是日本商业和贸易发展最早的一个地区。它也是大阪府的首府和关西地区的工商业和水陆空交通中心。此外大阪还是众多世界闻名的日本制造业企业诞生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

(2019-06-27 思客)

大国外交，泽润世界

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27日至29日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国际局势变幻不定、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大阪峰会吸引了各方关注，成为各国谋求互利合作、推动经贸发展、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会议。在以往的G20峰会中，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倡议，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世界展示出大格局、大胸怀、大担当，为解决国际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发出了中国声音，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赢得了各国的认可。



深化友谊，巩固对外交往朋友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一个构建大国关系、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大阪峰会将为各国沟通解决贸易争端、开展多边外交提供契机。例如，在峰会前的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话，确定将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随后，中美经贸磋商双方牵头人通电话，按照两国元首通话指示，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只有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在国际交往中做好朋友、好伙伴，才能不断扩大、巩固外交与经贸的朋友圈。与某些守成大国不断在全球掀起贸易争端、地区冲突不同，中国一直主张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推进协调合作，倡导G20成员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平等对话解决经贸

问题，照顾各方合理关切。今年G20峰会在我们的邻国日本举行，俄罗斯、韩国、印尼、印度等周边邻国也是峰会重要参与者，这也为实践“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持续改善中日关系、构建和谐友善的周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协同合作，共谱国际治理新篇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是为商讨、解决国际问题而生，也因其巨大作用而日益受到各国民众瞩目。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经济发展、地区稳定、气候变化、能源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中，关系人类长远发展、全球稳定的国际问题不断出现，面对传统和新生的国际问题，世界各国除了加强多边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清风起自东方，福泽广润世界，中国就世界经济、外贸投资、技术创新、文明包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议题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推动了全球主要大国相互协作，完善了国际社会合作治理模式，促进世界各国共同谱写国际问题治理新篇章。中国古语说：独行快，众行远。国际问题超越了一国一地的边界，国际社会只有坚持共同参与、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这次G20大阪峰会，中国携诚意而来，世界满怀期待，相信各国必定会携手并肩，求同存异，为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共享和平安宁做出有益探索。

普惠共赢，欢迎各国经济搭便车

习近平主席曾深刻地指出：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在部分国家和领域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日趋升温之际，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不断出台对外开放新政策，欢迎世界经济体“搭便车”。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国前5个月工业、投资、消费等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沿着平稳运行、稳中有进的趋势继续发展。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良好发展态势，关注中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看重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一百多个国家、数十个国际组织支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

六赴 G20，习近平始终强调这几点主张

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6 月 27 日至 29 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土耳其安塔利亚，从中国杭州到德国汉堡、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至今，习近平已经连续 6 次出席或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等等。数次演讲中，习近平始终围绕创新、开放、合作、共赢等关键词，为世界和平发展传递中国主张，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中国动力。

要坚持开放合作

我们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

互通提供了融资支持。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开放本身，而是不断提升开放的质量，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注重进出口贸易平衡，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与世界各国经济更高层次的互动。近年来，中国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塑造力、感召力不断提升，得到了包括 G20 成员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与肯定。

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2015 年 11 月 15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

保护主义政策如饮鸩止渴，看似短期内能缓解一国内部压力，但从长期看将给自身和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2016 年 9 月 4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2013 年 9 月 4 日，习近平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 5 日至 6 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13 年 9 月 5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2016 年 9 月 3 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要坚持伙伴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2016 年 9 月 3 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回顾历次 G20 峰会，从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到杭州、汉堡、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合作道路，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在即将召开的大阪峰会中，我们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贸易和国际治理注入新动力。

(2019-06-26 中国新闻网)

我们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只要我们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就能够克服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开辟未来增长的崭新航程。——2016年9月4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

2014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创新发展 实现联动增长》的重要讲话。独行快，众行远。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做好朋友、好伙伴，积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2014年11月15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2017年7月7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的重要讲话。这是峰会开始前，习近平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迎接。德国谚语说，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让我们携手合作，推动联动增长，促进共同繁荣，不断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2017年7月7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

要坚持创新引领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5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出席第一阶段会议。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体制机制变革释放出的活力和创造力，科技进步造就的新产业和新产品，是历次重大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复苏的根本。——2015年11月15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

我们既要鼓励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要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强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重视教育和就业培训。我们既要立足自身发展，充分发掘创新潜力，也要敞开大门，鼓励新技术、新知识传播，让创新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2018年11月30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要坚持普惠共赢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3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习近平出席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的重要讲话。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和发展问题相关。发展也是实现公平公正的强有力支撑。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2018年11月30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将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在做大发展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让百姓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我们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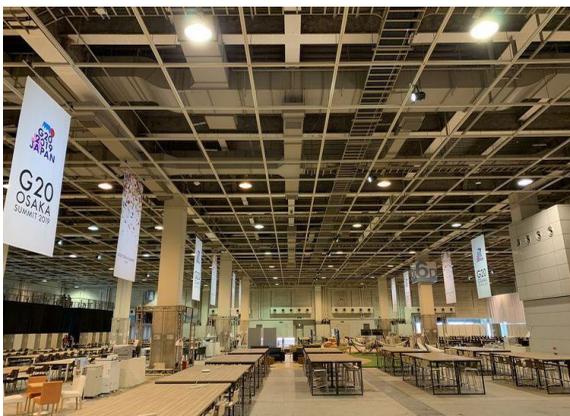
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面对重重挑战，我们既要增强紧迫感，也要保持理性，登高望远，以负责任态度把握世界经济大方向。——2018年11月30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

(2019-06-25 央视网)

G20 焦点议题 及政策建议梳理

随着中国不断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多边舞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开展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和多边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各国的主张往往与政治诉求、国家利益等紧密相连,部分国家的观点是带有特定目的,甚至是有失偏颇的。但我们仍然需要加以了解和正确辨识,从而知己知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

2019年G20于6月27至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这是日本首次承办G20峰会。根据安倍首相的发言,此次G20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社会5.0”(Society5.0)、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国际多边主义贸易规则等。本届G20峰会,国际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而日本作为主办方则特别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科技科技发展与监管两项议题。



国际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

维护多边规则、推动自由贸易,是今年G20峰会的重中之重。在去年12月阿根廷G20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明确表示促进自由贸易是大阪G20的首要任务。4月

25日,借参加布鲁塞尔峰会之机,安倍与欧盟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共同强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的重要性。此外,5月31日,中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也表示,期待并且支持G20大阪峰会能够取得成功,并更多地向外界传递推进多边主义、开放型世界经济正面和积极的信号。

当前,中美关系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此次G20峰会,将会有助于中美在某些问题上向前发展。此前的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在“贸易,投资与全球化”研究主题中所提出的第一项、第二项政策建议指出,国际贸易的成功是依靠规则而非权力,这表达了世界各国对当今贸易分歧的普遍立场。具体来讲,WTO应该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建立全球贸易秩序。加强WTO作为国家间的沟通平台作用,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包括“多速协议”(multi-speed implementation)、“复边协议”(pluri lateral agreements)和“关键大规模协议”(critical mass agreements)。此外,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美贸易争端能够有所缓和。为此,第一,美国必须回到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沟通机制上来;第二,中国必须真正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第三,中美双方需要切实解决两国矛盾;第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WTO在沟通世界贸易问题上的中心地位。

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

本届G20峰会或对基础设施质量标准提出建议,这也将引起广泛关注。在杭州G20峰会上,有关增强基础设施质量的倡议就曾被提出;2018年12月的阿根廷G20会议也发布了“二十国集团对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有关原则”(G20 principles on quality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旨在减少腐败并提高基建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

而本届G20峰会主办方日本力推制定有关基础设施

质量的指导文件，声称旨在解决近年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因大规模基建而面临的债务问题。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等欧美政要也曾公开表达过类似表述。

在6月9日的G20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会议上，与会各方已经对此达成初步共识。包括中国在内的G20国家代表签订协议准则，内容包含确保公路、铁路、港口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的透明度与可持续融资。该准则预计会在6月28日的G20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获得正式认可。

T20在“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与融资”研究主题中对有关基础设施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在第三项政策建议中为增加基础设施质量提出了具体的八项建议，具体包括：（1）调动税收收入与国内资源；（2）加强当地人力资源投资；（3）改革采购方式；（4）确立全球统一标准；（5）发挥国际多边发展银行的专业知识；（6）让中国成为包容的负责任国家；（7）建设为人工智能、5G等技术服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8）打击腐败。

科技发展与监管

如何运用、管理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一个时代命题。根据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对“Society5.0”的表述，科技监管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第四代科技革命技术，打通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边界，以服务人类社会。在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安倍首相就提出希望大阪G20

（上接第20页）

的5G标准，而各国5G实力的评价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标准主导能力、芯片的研发与制造、系统设备的研发与部署、手机的研发与生产、业务的开发与运营和运营商能力六个方面。

在工信部宣布颁发4张5G商用牌照后，华为公司发文表示全力支持，并表示，华为已经在全球30个国家获得了46个5G商用合同，5G基站发货量超过10万个，居全球首位。华为表示，自2009年起，也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端到端5G商用解决方案的通信企业。截至目前，华为共向国际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提交5G标准提案18000多篇，持续排名业界第一，其主导的极化码、上下行解耦、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5G国际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华为已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研芯片的规模商用，包括全球首款5G基站芯片组天罡、5G终端基带芯片巴龙以及终端处理器芯片麒麟980。

华为在5G技术方面的崛起引起了美国警觉。去年，特朗普政府先后对中兴和华为发起制裁，并以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尽力说服其盟国的无线通信和互联网供应商，

会议能够成为世界数据治理的一次里程碑。日本前首相、现财政部长麻生太郎在今年3月表示，科技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一个普遍问题，因而这一议题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比如，受邀参加G20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期就表示希望借机与日本合作发展数字经济。

T20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并从侧面反映出了主办国对此议题的重视。在研究主题“可持续发展的2030议程”“加密资产与金融科技”“数字时代的工作与未来教育”中都对此提出了各项政策建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议题是对科技公司与数据流动的有效监管。欧盟拟在G20大阪会议上提出对高科技公司的税收政策调整，议案包括根据科技公司的运营地而非总部属地来执行税收政策。6月9日的在日本福冈召开的G20金融部长与中央银行会议上，参会人员已经达成共识会争取在2020前会制定对科技巨头公司的统一税收政策，以有效弥补国家间的税收漏洞。同样在6月9日，于日本筑波市闭幕的G20贸易和数字经济部长会议上，与会代表通过《联合声明》与《G20人工智能原则》。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圩在主题发言时指出，数据流动要以完全为前提，人工智能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

（2019-06-27 光明网-理论频道）

避免使用中国华为的电信设备。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即使在美方肆意打压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业绩似乎还不错。

路透社报道称，代表750家移动运营商利益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禁止从中国供应商购买通信设备，将使欧洲5G网络成本增加约550亿欧元，并将导致该技术的推出延迟18个月左右。该行业报告指出，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公司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40%。“其中一半额外成本将归因于在通信设备市场竞争力明显减弱后，欧洲运营商所需要投入的成本会更高。”行业报告说，“在升级为5G网络前，运营商还需要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

包括英法德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已陆续表态，不会将华为5G产品排除在自身国家的5G建设之外。5月30日，英国主要电信运营商之一EE公司在6个城市开通5G服务，其部分基础设施正是采用的华为设备。此外，6月5日，华为已与俄罗斯最大电信公司MTS签约，将于明年在俄罗斯开发5G网络。

（2019年11期 中国经济周刊）

夯实 G20 “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地位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时代之问，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未来的重大命题。在处于大变局中的当今世界，更是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聚力推动的首要议程。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从哪里来向哪里去？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全球治理？我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国家主义主导的国际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演绎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虽然关于世界的人类理想渊源久远，但国际治理思想还是应该追溯到“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他提出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律约束国家间关系，对形成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以及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法为基础的第一个国际治理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启国际法律治理的先河。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国际联盟盟约》为核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由于过于理想化导致举步维艰，但国际联盟作为以多边协商取代单边霸权的积极探索，作为用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尝试，开启了国际政治安全治理的先河。前两个国际治理体系，都是在世界“支离破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都是作为战争产物以战后安排为主建立的，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把世界多数国家排除在外的。因此，只能算是

国际治理体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治理体系。

第三个里程碑，是1945年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包括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集体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称世贸组织）以及后来瓦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构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由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法及国际规则等构成的国际法律体系等。雅尔塔体系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国际秩序支撑，其制度框架延续至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是国际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然而由于雅尔塔体系建立后不久，冷战风云就笼罩了世界，出现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局面，形成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分而治之的两极格局，在近半个世纪里，沦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政治平台。

至于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的发展，有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非战争方式坍塌，国际体系进入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转型调整时期。1990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前瞻性地提出，各国要适应国际体系新走向，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并于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天涯若比邻》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涵义和理念，提出全球安全与治理倡议。应该说，这顺应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即冷战结束打破了全球分割分裂局面，需要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规范和管理，开启当代全球治理理念的先河。第二个事件，是八国集团的组成。1997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集团吸纳俄罗斯参与，试图以冷战后的“大国合作”模式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使之成为“美国治下”、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主要机制。但由于缺乏包容性、代表性和影响力，七国集团也好，八国集团也罢，都沦为坐而论道的“大国俱乐部”。

第三个事件，是二十国集团的设立。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冷战后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原有全球治理体系缺陷和弊端暴露无遗。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等额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应运而生，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改革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

近10年来，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在国际、区域和一系列重要议程上，推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及其机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建立起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扩大了联合国发展议程，推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签署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东盟、欧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加强区域综合治理，相关方自愿组合对话解决伊核等热点问题，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大国和南南合作新平台。凡此种种，都顺应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全球治理参与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多边议题话语权、发展利益分享权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共同挑战更多关切，推动全球治理从两极争霸、西方主导向南北共治方向演进。

全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内容和未来走向，都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

一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继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以信息技术、网络通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集群式发展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呈现出机械化与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融合发展趋势，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着国力提升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引发经济、社会 and 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对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等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牵引下，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加速整合融合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大市场自由流动并优化配置，各国互联互通、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地球村”逐步生成，全球经济社会均衡稳定、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各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亟待协调平衡。

三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原有大国继续保持优势

地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总体朝南北均衡方向发展。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叠加，国际和地区组织更加活跃，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影响扩大，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多样。国际机制需要适应新兴力量上升态势，国际权力必然出现分散化趋势，少数国家主宰世界、多数国家被排除在外的局面难以为继。

四是全球性挑战更加多样。世界整体性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使国际社会面临更多共同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对全球治理有重大而紧迫的需求。经济危机、地缘冲突、恐怖主义、生态恶化、难民涌动、跨国犯罪、公共卫生以及网络、能源、粮食安全等威胁挑战，都不是靠强国之力或独善其身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加以应对，维护人类和平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时代、多极化世界、信息化社会面貌显露，国家主义至上的狭隘性以及原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适应性和有效性显然落后于时代，加强全球治理和改革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以二十国集团诞生为起点，国际社会在全球和地区组织平台上，通过紧密型或松散型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欧洲、东亚等地区治理取得一些成功经验，卫生防疫、救灾缉毒、航空海运、边界管控等领域治理成效显著，形成多元多样的地区和领域治理模式及平台机制。但总的来看，全球治理受到霸权强权羁绊，治理体系存在缺陷，各国地位极不平等，价值利益差异较大，权力和责任严重失衡，治理主体权威不够，治理能力亟待提升，在很多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

特别是美国认为自己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透支了、受损了，让其他国家“搭了便车”“占了便宜”，以特立独行替代认为“吃亏”的国际规则，用“退群”举动冲击主导建立的制度体系，急于摆脱无利可图的治理义务，两年创下退出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历史纪录。例如：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涉及国际法院管辖问题议定书，大幅削减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助机构、反恐机制等资助，严重影响联合国有效运转，造成部分机构瘫痪。面对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压力倍增，二十国集团功能和影响下降，全球经济治理均衡化和民主化趋势停滞。特别是美国停止履行《中导条约》、宣布退出《武器贸易条约》、不再公布核武器数量、可能恢复使用低当量核武器等举动，撼动维系全球和大国战略稳定的军控及核裁军体系，引

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的质疑和冲撞，恶化了国际合作氛围，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机制缺失、动力减弱、效能降低，出现失能失序状态。

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

中国文化的世界理念古而有之，“以天下观天下”而非“以国观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和谐世界”等中国的“天下观”，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理想主义的美好期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经历了从隔绝到开放、从怀疑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

第一，在继承和发展中创新全球治理理念。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来源于中华文化积淀、新中国外交思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探索与时代呼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前提是，做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与各国携手合作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当今世界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总体目标是，推动形成以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力图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分野，以“人类中心主义”冲破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全球相互依存条件下各方实现共存共赢的唯一路径。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全球治理应该主体多元、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治理体系要有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尤其要让长期受到排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获得与其地位和影响相符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是对丛林法则、零和思维、强权政治的根本否定。

第二，顺势而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中国坚持立足现实、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能够做的事情，与国际社会一道先做起来，循序渐进加

以推动，促进提高全球治理效能。中国参与推进联合国系统相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代表性和发言权。发起建立发展中国家参与或主导的全球治理合作平台，努力补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南方缺位。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包括设立金砖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将其打造成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支持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盟、阿盟等积极发挥作用，推动加强亚信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建设，扩大地区自由贸易安排布局。积极参与制定网络、海洋、极地、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并身体力行。

第三，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促进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践舞台，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和互联互通互融途径，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新模式，迄今吸引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机制、新动力。

第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安全领域，坚持劝和促谈，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促成伊朗核问题六方协定，推动叙利亚、南苏丹、阿富汗、缅甸等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派军舰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在发展领域，宣布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推动各方达成并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国内大力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推动制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率先发布国别落实方案，积极促进全球范围内经济平衡发展。在社会领域，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发起并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

尽管全球治理从理念到实践、从平台到机制，都还远远跟不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积极探索，对于改革建设转型变化中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各国各界在世界乱局变局中，多出睿智的思想，多发理性的声音，多做有益的贡献，为我们共同的世界争取美好的未来。

(2019年19期 中国新闻周刊)

贸易争端背后的 全球供应链巨变

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朝着达成贸易协定的方向努力前进，投资者一直在紧张地翘首以待。不过，即便中美达成协议并停止互加关税，企业经营发展之道可能也无法再一如从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被重新调整。持续数十年的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已经开始逆转。全球化正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承受重压。

英国脱欧势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筑起新的贸易壁垒。印度则刚刚采取行动限制外商在线销售商品。对于自由贸易的全球性共识正在不断被侵蚀，这已促使美国企业调整供应链，常见的做法是将供应商转移到距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



主导力量

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增长率基本上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自2012年起，贸易平均增速仅仅略高于全球GDP增速。今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壁垒增加的双重打击下，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贸易增长预期从4%调低至3.7%，并称一季度贸易景气程度回落至2010年水平。

今年2月，运往美国的海运发货量下降了4.5%，其中从欧盟发出的发货量下降4.6%。根据供应链数据提供商磐聚网(Panjiva)统计，这是近两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下滑。最近，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对在中国

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中的超过200名高管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近来的贸易争端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调整商业战略的机会。展望明年，4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将寻找新的供应商，并且42%预计将从其他地区采购原材料。全球化不再是世界主导力量，企业高管们正在努力适应这样一个新环境。

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 SWK)首席财务官唐·艾伦(Don Allan)说：“我可能从来不会认为全球化正在走向尽头，但是我已经开始感到困惑。大趋势似乎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各国正变得更加强调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再注重怎样进行经济全球化合作。”让艾伦倍感挫折的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变化。比如，金融危机以来欧盟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可以肯定地说，一种巨大转变过去十年间已经在发生，并且它在过去五年变得更快了。”艾伦说。

这种转变出现在一个技术和政治深远变革的时代——包括新兴机器人制造技术的出现、北美能源热潮，以及中国在政府引导下出口高增值商品的做法——新的变化已经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和调整它们在全球的布局。这些变化可能最终会比逆全球化更加强大，进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调整供应链

在这些大趋势中做出投资决策将会是棘手之事，因为这样的趋势可能会持续长达数十年。一些投资者认为，人们能够从供应链的变化中觅得投资机遇，方法是购买那些将受益于新的中国投资的股票，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电池。还可以把目光转向那些将在全球贸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国家，比如越南。或者，买入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股票。新的变化已经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和调整它们在全球的布局。这些变化可能最终会比逆全球化更加强大，进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宣扬全球贸易的理念已有多多年，但全球贸易放缓甚至逆转不是一种历史反常现象。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分析师阿杰·辛格·凯普尔（Ajay Singh Kapur）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经经历过周期性的起伏。他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趋势，只不过是懒惰的知识分子把一种长周期混淆成了‘永动机’。”他的那份报告中包含一张追溯至耶稣诞生时的图表。

不过，20世纪后半叶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看似成为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2007年，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说：“是市场力量在管理整个世界。”这种观点在当时看来几乎无可辩驳。从1950年到2007年，全球贸易额平均每年增长6.2%，几乎是全球人口增速的四倍之多。交通运输成本下降，区域分工确立，生产商追求最低成本投入，供应链变得更长且更复杂。

起初，全球化趋势伴随着发达经济体劳动者稳定的就业和薪资增长。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制造商撤出发达经济体寻求更廉价劳动力，那些增长数据便趋于恶化。1975年，制造业占全美GDP的20%以上，占全部就业的22%以上——而今天，这两项占比分别仅有11%和9%。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非管理岗位的美国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在其他发达国家中，类似一幕也在上演：制造业下滑，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

对于全球化所谓赢家的政治抵制，在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事件中显现出来。为了保护就业，各国开始寻求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同时筑起前所未有的贸易壁垒。企业供应链决策罕见地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担忧。不断增加的关税和特朗普愤怒的推文并未使得“中国制造”的标签轻易从美国品牌的服装上消失。由美国设计、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已经在中国失宠，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国产品牌。

在这样的政治暗示之下，多数企业在调整供应链时往往默不作声，以免招来反弹。《巴伦》联系了超过50家不同规模的公司，它们或已申请关税豁免，或已考虑改变供应链。其中只有两家愿意就此发声。

“回流”美国？

美银美林分析师安德鲁·奥宾（Andrew Obin）认为：“创造就业（或者说无法创造就业）很可能是企业摇摆不定的关键原因。”即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回美国本土，它们也可能会使用更多机器人，而不是人力。这些企业担心的不仅仅是引起特朗普的不悦。“对于那些将生产

转移出中国的企业来说，它们可能也不想公开宣布它们的举动。”奥宾说。

不管怎样，美国企业这种所谓“回流”正越来越多。非营利组织“回流倡议协会”（Reshoring Initiative）称，2016年，美国通过企业回流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了因企业转移至海外而流失的就业岗位，这是自1970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2017年，雇主们宣布把创纪录的82250个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本土，而2010年这一数字只有区区3221个。根据初步统计，2018年企业宣布回流岗位数量有所减少，降至53420个。“回流倡议协会”创始人哈里·墨瑟（Harry Moser）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政府职能失调，以及美元小幅上涨”造成的。但他认为，回流趋势是有力而持久的。“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小范围现象。”他说。

许多企业发现，将产品采购或组装线重新布局到距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策略。这样做的回报是：运输成本降低且速度更快、复杂程度和供应中断的风险降低、库存要求减低，以及在产品销售地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政治利益。

美国运动相机厂商GoPro（GPRO）保留了其位于中国的工厂，以满足亚洲客户需求。但它计划将销往美国的相机的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墨西哥。公司首席财务官布莱恩·麦吉（Brian McGee）在上个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说：“虽然关税威胁成为提高供应链效率的某种催化剂，但即便不考虑关税因素，这种方式从战略上而言也是有意义的。此外，我们也将节约一定的成本。”

孩之宝（Hasbro, HAS）去年年底开始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工厂生产培乐多彩泥（Play-Doh），这是这家公司自2004年以来首次在美国生产这种玩具。孩之宝称，较低的交通运输成本是促成决策的影响因素。

太阳能设备生产商SunPower（SPWR）也同样致力于更多地在离终端市场更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在某些利润率极低的行业，降低海运和其他物流成本直接决定了一家公司的盈利与否。SunPower的拳头产品是一种玻璃封装的太阳能组件。该产品对电厂的售价是每瓦特1美元，对居民用户的售价达到2.25美元。其成本中有至多10美分都与物流相关。SunPower首席执行官汤姆·沃尔纳（Tom Werner）对《巴伦》说：“商品越大，物流成本就越高，企业也就越希望重新布局生产线。太阳能板将会是太阳能企业最先寻求重新布局的产品，以便使产品距离终端市场更近。”SunPower已经在墨西哥扩大生产规模，专门生产销往美国的产品。去年，公司甚至还收购了一家小型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其他公司也采取了类似行动。20 世纪初期，史丹利百得公司的前身主要在美国生产商品。但是公司首席财务官艾伦说，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生产活动开始逐步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转移。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销往美国市场的产品中仅有 25% 是在美国国内生产的，而随着企业逐渐回流，这一比例已经升至 50%。企业做出“回流”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会吸引那些青睐美国制造工艺的消费者，即便这些商品的生产方法与在中国相同。

“我不敢说每个美国人都希望购买美国制造的所有东西，但我认为，对于某些行业来说，过去十年里人们对于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已经增加了。”艾伦说。他预计，史丹利百得在美国销售的商品中，最终会有 80% 在美国国内生产。

美国页岩油热潮和精密炼油厂在墨西哥湾广泛兴起，也促使企业重新调整区域布局。贝恩咨询合伙人、全球供应链咨询业务团队负责人彼得·格拉亚（Peter Guarraia）说，这两个因素使得美国更少地依赖海外石油，同时促使能源密集型产业迁往美国或墨西哥以节省成本。他说：“想想那些基础投入型产业，例如化工和化肥行业，以及任何以能源或石油为基础的行业，你就会意识到大量生产活动将从中国转移出来并回到美国。”

企业将继续寻求恰当的平衡，在一些地方节约人力成本，同时在另一些地方削减运输费用，从而降低总投入成本。格拉亚补充说道：“劳动密集型行业短期内更有可能留在亚洲，因为东亚市场仍有巨大的劳动力优势。”

贸易放缓

随着新的贸易壁垒出现，最近几个季度，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对于某些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可能导致中国退出其供应链。从 2010 年以来，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增长一倍还多。而关税威胁已经使得东南亚其他国家变得更有吸引力。

据称，为苹果公司（Apple）生产无线耳机 AirPods 的中国公司歌尔声学（GoerTek）去年曾告知供应商，公司将把生产线迁到越南。这意味着，歌尔声学将加入 LG 电子（LG Electronics, 066570. 韩国）和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SSNLF）的行列。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科技行业：化工企业亨斯迈（Huntsman, HUN）去年夏天宣布在越南开设工厂，这是它在亚洲除中国之外的地区首次建厂。实际上，据信息供应商 IHS Markit 统计，去年越南制造业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亚洲主要国家。

共同基金铭基国际（Matthews Asia）首席投资官罗

伯特·霍洛克斯（Robert Horrocks）说：“我的确认为，最具潜力的地区将会是东南亚。从那里出发，你能够相对容易地进入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不断增长的印度消费市场和日本市场。便捷的集装箱运输还能横跨至欧洲。”

中国志在高附加值产品

中国自身则有着更大的雄心。中国的目标是自主研发更精密的产品，而不是简单地对别国设计的产品进行组装。霍洛克斯补充说道，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可能需要“将组装业务和人力劳动外包至其他国家，中国也有资本这样做。”他预计，拥有年轻劳动力、相对较低工资水平和深水港口的越南会是最大受益者。

要从这一趋势中获利，霍洛克斯建议投资者避开那些为外国企业组装商品的制造商。他说：“比如，你可以直接投资越南等国家的制造商。但我们所讨论的供应链中的这些环节总体上附加值较低，并且在这些情况下你还受惠于更大的经济体，无论是美国的苹果公司或者韩国的三星。”

制造业蓬勃发展有益于当地经济，进而会带来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霍洛克斯强调说：“因此，最佳投资之道就是选择那些具有巨大竞争优势、能够从新兴工业劳动力群体不断增强的购买力中获利的当地企业。”

铭基亚洲新兴市场基金（Matthews Emerging Asia fund, MEASX）持仓最多的公司是海鲜加工商永环（Vinh Hoan, VHC. 越南）和西贡啤酒（Saigon Beer Alcohol Beverage, SAB. 越南）。交易所交易基金 VanEck Vectors Vietnam（VNM）投资于越南本土企业及在越经营的跨国公司。封闭式基金 VinaCapital Vietnam Opportunity（VCVOF）也投资于越南本土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正集中精力自主研发高附加值商品，而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组装产品。霍洛克斯预计，中国不仅会在科技和汽车领域成为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已经吸引了全球目光——在生物科技等领域亦是如此。他预计：“你将看到医疗健康行业在中国的巨大发展。”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则建议投资者选择那些专注于其他领域的中国公司，这些领域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比如说，废弃物处理领域的专业公司，如光大国际（China Everbright International, 257. 香港）；风电设备制造商，如中国大唐（China Datang, 1798. 香港）。可再生资源和电池生产商比亚迪（BYD, 1211. 香港）也处于中国的高增长行业。

复制中国优势？

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这些转变就已经开始，但是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使之加速，并不时让美国企业决策过程更加复杂。

对史丹利百得来说，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美国生产一些特定商品的成本变得更高。对中国的钻头卡（一种用于拧紧钻头的钳子）加征 25% 的关税，提高了美国制造商在这个部件上的成本，而竞争对手可以从海外进口制成品而免受关税问题困扰。“相对于竞争对手，我们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增加了。”公司首席财务官艾伦为此感到惋惜。

企业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通过提高价格来抵消增加的成本。贝恩咨询对于公司高管的调查显示，仅有 33% 的受访者打算让消费者为关税增加造成的影响买单。这标志着，企业更希望通过重组供应链来避免或最大程序减小关税带来的影响，而不是提高消费者价格从而威胁销量。



全球供应链和运营咨询公司 Maine Pointe 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文 (Steve Bowen) 认为：“这改变了企业看待其整个供应链的方式。我们正帮助这些企业寻找新的供应商。过去它们只考虑 4 家，而现在它们会考虑 20 家到 25 家。”鲍文说，希望推出新产品的科技企业“会倾向于用不同的公司来生产产品，而不是仅仅依靠一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未来四五年里，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发展。”他说。

鲍文的一家制造业客户一直使用中国的钢制品，而现在，这家企业开始到欧洲去寻找供应商。“如果关税落地，他们会重新考虑从中国购买钢材这件事。”鲍文说，“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未来供应链的潜力。”然而，在某些行业，未来的供应链不可能复制今天的成功。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过去 20 年里，中国彻底改造了科技制造行业。

有些企业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中国工厂，它们很难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音响设备制造商搜诺思

(Sonos, SONO) 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斯彭思 (Patrick Spence) 说，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多个“产业公地”

(industrial commons) 所在之处，短期内无法在其他地方被复制。搜诺思的音响就在中国的两处工厂进行生产。斯彭思解释说：“我们的产品涉及数百个零件、数以百计的供应商，而它们全都位于中国。基于那种复杂程度，这些联系可能是历经超过 30 年才建立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在中国是有原因的，这种格局很稳定，如今运转良好。”

虽然 SunPower 将一些销往美国的太阳能板的组装生产线移至墨西哥，它依然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采购一些零件。在这些国家，存在着一种零部件生产商生态系统。这些企业相互之间距离很近，这让 SunPower 能够以高效且低成本的方式组合原材料。公司首席执行官沃尔纳说：“运输生产太阳能组件的玻璃成本可能不贵，但那却可以决定公司的盈亏。”田纳西大学全球供应链学院执行主任沙伊·斯科特 (Shay Scott) 认为：“这不仅仅是产能问题，而是负责设计、创新和生产的那个群体中形成的隐性知识。你不能打个响指就去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再造这些东西。”那些离开中国、前往人工成本更高的地区的企业，可能将依靠自动化来降低成本差异，它们还将受益于更低的运输成本或能源开支。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预测，2009 年到 2021 年期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数量会增加超过十倍。包括洛克韦尔自动化 (Rockwell Automation, ROK) 及发那科 (Fanuc, FANUC) 在内的机器人制造商正在努力让自动化应用成本低于境外生产。

史丹利百得已经加大了对机器人的使用。艾伦说，机器人的使用并没有取代人工，相反，公司对工人进行了再培训以便操作机器人（尽管使用机器人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招聘数量）。他还说，机器人正使得公司能够以更加合理的成本将生产迁回美国。“这没有完全抹平中国这样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成本差异，但确实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差距。”艾伦说。史丹利百得现在因关税问题每年增加 1.5 亿美元成本，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影响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使中美达成贸易协定，艾伦也不认为关税会被彻底取消。“随着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关税问题日益突出，我们不得不更积极地去考虑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快速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呢？”艾伦反问说。全球贸易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即使中美重修旧好也不能阻止这种转变发生。

(2019 年 14 期 财经)

须高度重视贸易战纵深战场

自去年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为达到遏制中国、逼中国就范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步步紧逼、逐步加码，已经到了不讲国际交往基本规则、不讲信用的地步。由此也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可以预见，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会是短时期的，更将远超出贸易范围。美国副总统彭斯 5 月 30 日在加拿大公开声称：有必要时会对中国输美商品征税两倍以上。美国白宫原首席战略师班农认定把华为赶出西方市场比贸易上的较量重要 10 倍，也是他叫嚣要把中国企业统统从资本市场赶出去。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台 Fox 主持人公开呼吁要动用金融工具与中国打金融战。



事态越来越清楚，美中的战场绝不限于贸易领域，一定是技术、信息、金融搏杀交织而来，同时美国还能在其他问题上给中国添堵，其实这已是一种准冷战。现在中国一方面在诸多技术领域要亡羊补牢、做补课追赶的事，另一方面一定要在金融方面有些准备，要对贸易战的纵深战场——金融市场防卫御敌有全面的应战筹划，包括应对离岸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做空及外资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撤离和产业转移。不仅要考虑在贸易领域与对手博弈的战略战术，更要考虑在金融市场各方面应对冲击和挑战的战略战术；不仅要考虑在国内御敌的战略战术，更要考虑在海外御敌的战略战术。

要在长时间的贸易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在贸易战的延伸战场——金融市场有全面的应战防御部署，包括支付结算的、汇率管理的、产业融资的、资本市场应力强化的等方面。对因贸易战、技术战甚至金融战所

可能引起金融冲突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要有系统的检讨，找出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点，尽快形成弥补措施和强化部署，以免在未来博弈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

要着重解决经济活动杠杆水平过高问题

首先应当看到，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必须经历国际金融市场博弈及洗礼过程，国际金融挑战又分两种：一是因境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传染；一种是域外对手出于遏制、扰乱目的而有意发起的攻击。

虽然中国金融业在资产规模、机构数量上都应是金融大国，但却存在包括拥有巨额金融总资产，但发展质量不高、大而不强；国家流动性充沛但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困扰；拥有相对完备的金融管理体系，但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形势仍然严峻等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大而不强、供给水平低、融资结构偏狭，资本市场缺乏韧性、行业风险抵御能力弱等方面。

要提高中国金融业抵御外部挑战的能力，当务之急在于强筋健骨，活血化瘀：要着重解决经济活动杠杆水平过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负债过高的问题、证券市场应力严重不足及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问题。消除病灶：主要消除中小型银行不良资产水平过高、存在潜在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资产从规模上不能覆盖负债、从期限上二者错配乃至偿付能力不足问题。

关键在两方面要有可靠的准备：一是要清楚有关金融机构的风险底数，二是要有能防患于未然的必须准备。对中国而言，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尤其要警惕金融业出现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濒临爆发点的存量风险要采取单点引爆的方法，而不能批量释放；对增量金融资源投放反倒要严格过滤风险，不能在增大投资的同时过度吞纳风险，这必然加大金融市场的脆弱程度。同时要看到，随着中美冲突范围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一些处于上游产业链的企业不排除会转移，会导致产业链的重组甚至断裂，会带来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对此，要前瞻性地形成应对预案，设定风险抵御底线，力保不发生不可控局面。

稳定汇率预期和资本市场预期应是重中之重

不同经济体发生贸易战，贸易量、关税、价格变化只是双方短兵相接的部分，最后一定在货币市场、汇率市场、证券市场变化中表现出来，如近日离岸人民币汇率离破7已是一步之遥。

而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更会成为境外投资者取舍是否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重要考虑，也会成为境外某些资金做空人民币资产的关键突破口。因此在中美贸易战局势未明朗之前，稳定汇率预期和资本市场预期应是中国丝毫不能放松的重中之重，并应为此形成互相呼应的防御机制和有效市场手段。在两国贸易、技术冲突博弈期间一定要以市场稳定为先。

致力创造华为级金融企业发展所需的开放环境

贸易战背后是资金在全球的流动及在不同经济体间的结存变化，并进而会对本身及他方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贸易战必然引起金融市场变化甚至震荡，而金融市场的韧性及效率波动，又反过来会影响到贸易战的局势及博弈变化。为赢得贸易战的最后胜利，强化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强化资本市场的应力刚性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方面。要立足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构建能在各金融领域占据竞争制高点和铸就杀手锏的新的体制机制，致力创造华为级金融企业发展所需的开放环境。

众所周知，高质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来支撑，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中国今天的金融开放不能仅聚焦于机构数量的增多，而是要着眼于金融产品供给层次的提高、服务水平的提升、风险化解能力的增强及金融市场效率的持续改善。

无论在哪里，金融产品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的差异，但围绕产品的中后台效率和风险管理却是问题的关键，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国、一个行业的真正竞争能力和服务能力，看出产品的性价比。

持续增加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

金融战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资本的流向变化，对中国来说，持续增加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无疑是应对贸易战持续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一方面应是存量外国投资的继续存留，另一方面则是吸引更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而为了真正达到目的，中国就要致力形成确立被国际市场认可的金融监管标准、手段及效率，建设以服务效率和论优劣的市场文化，促进整个行业优胜劣汰市场机制的形成。

与此同时，要清醒意识到，与以往大国发生冲突所

处的时代不同，当前发生在美中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正处数字经济时代，必须承认，在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某些领域美国是占有优势的，即便按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美国虽为守成大国，但仍然不失为创新强国。从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竞争能力及应对外部金融挑战两方面考虑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优化问题，中国必须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上有更系统的部署，立足赶超，力争早着先鞭。中国目前在移动支付领域已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应在改变全球金融支付体系上有所谋划并争取有所成就，积极推动扩大有关服务技术在海外市场的应用，以利未来掌握国际金融竞争的主动权。

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要有所引导和控制

金融结构直接影响到金融行业的功能及竞争力，影响到应对国际外部冲击和挑战的能力。金融资源二元配置形态在中国金融行业广泛存在，这无疑会大大削弱整个行业的协同性和效率，如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结构、不同市场的功能衔接结构、不同融资体系的效率结构等。

如至2019年4月，我国存款类机构的本外币国内贷款达到了14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中长期贷款89万亿，占国内贷款总额的62%，可谓是非常之高。这不仅是导致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之一，也会对贸易战局势下的资金运筹造成一定掣肘。

故未来一段时间从国家层面，一应考虑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统筹配置比例和效率要求，二要从行业层面考虑贷款期限结构不同对全社会资金运用的不同掣肘。即使是政策性金融也要讲究风险控制 and 效率约束，不能在某种政策目的之下搞粗放式经营，更不能成为跑冒滴漏金融资源的平台。

当前中国对那些已陷入债务风险的国家投资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要避免成为议价能力衰减模式

(obsolescing bargain model)的受害者，即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越多，其议价能力就会越低。政府有关部门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及规模要有所引导和控制，以防止向对手输送弹药的不当情形出现。

一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高低及竞争力强弱与监管水平如何具有绝对的关系，监管不到位就是养痍遗患，只能造成行业混乱；监管水平低绝不能换来金融业的高水平发展。在贸易战向纵深市场延伸的当下，金融监管机构应更多地承担起金融市场应战统筹的任务，在摸清对手可能发难的套路、时点和方向上及早形成判断，及时发出预警指引，以使整个行业能做到有备无患。

(2019年11期 中国新闻周刊)

5G · 5 问

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4家企业颁发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相较于此前国内各运营商官方给出的时间表，工信部将5G牌照的发放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2020年是欧美日韩等全球主要国家5G正式商用的时间节点。

5G是可以给全世界带来革命性改变的通用技术，背后隐藏着万亿级的巨大市场。5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在2019数字经济大会上表示：“5G正在给数字经济带来新一轮洗牌，哪个国家能够走在前头，就占领了下一轮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5G的背后，是标准的竞争，更是国家间的较量；颁发商用牌照，则是中国5G提速发展的发令枪。



5G是什么，它到底有多牛？

什么是5G？让我们重温一下工信部颁发5G商用牌照的原文：工信部经履行法定程序，于2019年6月6日向4家企业颁发了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4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其中，“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即是5G，“G”则是“Generation（代）”之意。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定义了5G技术的三大业务场景：eMBB（增强移动宽带），面向3D/超高清视频等大流量移动宽带业务；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面向大规模物联网业务，主要包括工业互联网等应用；uRLLC（高可靠低时延通信），主要应用代表是无人驾驶汽车等。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相比于3G、4G，5G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世界全连接的问题，“人与人的连接已经基本解决了，5G从一开始瞄准的就不仅仅

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包括人与物的连接、物与物的连接，这将是一个全面互联的时代。”

在刘兴亮看来，5G有四大重要特点：高速度、泛在网、低功耗、低时延。5G网络的理论传输速度超过10Gbps（相当于下载速度1.25GB/s），是4G的数十倍乃至100倍；同时时延低于1ms，是4G的十几分之一。泛在网指的是网络无所不包、广泛存在，比如此前家里的网络死角或在没有信号的大山，将不复存在。低功耗则是5G必须完成的使命。在实现全面互联的过程中，若物联网产品的通信过程消耗大量能量，很难被用户接受。如果能把功耗降下来，让大部分物联网产品一周充一次电，甚至一个月充一次电，将大大改善用户体验。

从1984年基于模拟蜂窝技术的1G无线通信出现到现在，全球通信产业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也经历了从追赶者到领先者的转变。1990年开始，2G主流技术标准发布，全球进入数字通信时代。在1G和2G时代，主导世界标准是欧美，中国没有任何话语权。

10多年后，3G开始商用，全球通信产业仍由欧美主导，但是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标准成为全球三大标准之一，在国际通信标准制定中初步有了话语权。3G标准发布于2000年，工信部直到2009年才发布运营牌照，整整延迟了9年时间。4G时代源于苹果公司iPhone 4手机的发布，4G率先在美国商用，从此美国取代欧洲占据通信产业主导地位，而中国推出的TD-LTE也正在成为国际主流标准之一。

5G的商业市场有多大？

从消费到产业，从人与人的连接到万物互联，5G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6月6日，就在5G商用牌照落地当天，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下称《方案》），其中提到：鼓励5G手机研制和上市销售。加强人工智能、生物信息、新型显示、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手机上的融合应用。推动办公、娱乐等应用软件研发，增强手机产品应用服务功能。

工信部部长苗圩此前曾对媒体表示，将来20%左右的5G设施将用于人和人之间的通信，80%用于物和物、物和人之间的通信，也就是物联网。中国工程院院士鄧

贺铨则提醒說，5G商用20%面向消费者、80%面向产业的格局，需要等到2035年左右；5G刚开始商用时，以面向消费者为主。《方案》着眼的是今年和明年，暂时只涉及苗圩所言的20%部分。实际上，5G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另外80%。

在获颁商用牌照前，运营商已提前开始5G布局。2018年8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第一批18个城市进行了5G试运行。2019年3月，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表示，计划今年年底前，在五环内实现5G信号全覆盖。中国移动技术部总经理王晓云6月6日透露，今年中国移动将在40个城市实现5G覆盖，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在终端方面，中国移动启动“中国移动5G终端先行者计划”，联合产业推出了10余款5G手机和数据终端，预计年内将超过30款，并逐步推动终端价格下降。其副总裁简勤表示：“到2020年，5G手机价格有望降到1000-2000元。”作为统一的5G基站建设者，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日前透露，目前北京的大型5G基站已经建好了4400多座。

在产业建设方面，中国移动表示将发起设立总规模300亿元的5G创新产业基金，首期100亿元已募集多家基金参与；中国联通则成立了5G应用创新联盟，目前已有240余家企业加入；中国电信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同时，作为基建企业，华为、中兴等公司也早为5G做好了准备。华为6月6日发布的消息显示，从去年4月份开始，华为已经在中国40多个城市与中国三大运营商开展了5G规模商用试验，包括城区、室内、高速公路、地铁等多场景实测，均已达到商用标准。

中兴则称，5G作为公司发展核心战略，经过多年投入和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了完整的5G端到端解决方案的能力，在无线、核心网、终端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已经做好全面商用的准备。

5G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0年前，整个中国都因3G时代的到来而兴奋，人们憧憬着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这种兴奋，随着5G脚步的临近，再次出现。“3G和iPhone、Android一起开启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现在，5G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它也将大规模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刘兴亮说。

5月18日，在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主办的2019数字经济大会上，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副总裁项焯妹展望了5G时代的生活方式。项焯妹说，相比4G，5G在普通生活中会给人更好的体验，“比如高清视频、沉浸式的游戏，在家里戴个VR眼镜跟远程老师互动等。”项焯妹还举了一个例子。她说，“2K、4K、8K的视频清晰度在手机上看起来不出来差别，但是在大屏上差别非常明显，我们曾签过一个协议，医院要通过4K、8K来指导手术，这就需要5G。富士康CTO也给我说，他们生产的钻头只能通过8K拍照并放大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否合格，这是5G在产业的结合。”

中国移动此前曾发布5G展示案例，案例显示，4G网络下载半集电视剧的时间，在5G网络下可以下载完10集，相应的玩游戏的体验也将会更好。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5G的覆盖面足够广，网络足够稳定，大量的手机本地计算能力都可以放到云端，不需要运行本地软件，甚至CPU的本地算力都可以大幅降低，减少手机体积，把本地资源集中到网络传输和显示上来。

业内人士预计，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5G用户量或将迎来发展节点。明年一季度，5G手机的价格可能更便宜，同时货量更足，用户使用意愿更强。而在明年四季度，5G技术进一步成熟，基站覆盖面积进一步增大，5G手机可能会降至一个更合理的价位，5G用户数量将迎来另一个爆发点。另外，工业制造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医疗等行业趋势，也会随着与技术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而逐渐走入现实。

中国的5G技术将为世界带来什么？

6月7日，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中表示，中方愿同各国分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中国在全球5G技术研究和标准化方面已经开始发挥引领作用，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上更是拥有主导权。在工信部颁发牌照后，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5G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

“5G背后的较量不仅是企业间的角逐，更是国家间的较量。5G较量的制高点是标准的竞争。在3G、4G时代，中国企业在标准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当5G来临，已经有中国企业站出来，喊出自己的声音。”通信行业专家、飞象网CEO项立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项立刚说，5G标准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从编码、空口协议到天线林林总总，众多的标准一起形成了整个

(下接第9页)